

[首页](#)
[名家博览](#)
[学术视野](#)
[随笔杂谈](#)
[资料目录](#)
[课程建设](#)
[书讯影讯](#)
[动态要闻](#)
[青年园地](#)

 本月热词: [论文](#) [评论](#) [国际新闻](#) [妇女](#) [体育](#) [经济](#) [访谈](#) [国内要闻](#) [文史](#) [科学](#)

 搜索: 


[◎ 主页 > 学术视野 > 其他 > INTRODUCE](#)

## 陈思广：《呼兰河传》接受 70年:四种视阈与三个问题

 2012-10-17 15:51 作者:陈思广 来源:《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2.6 浏览:次 [我要评论 \(条\)](#) 字号:

[大](#) [中](#) [小](#)

**摘要:**摘要:70年来,《呼兰河传》的接受实绩主要集中在四种视阈上,即:文本审美、鲁迅影响、女性视野和文学定位;值得商榷的问题亦集中在三个观点上,即:“寂寞说”、“枯竭说”与两极化倾向。前者体现进展,后者有泡沫之嫌。关键词:《呼兰河传》接受 70

**摘要:**70年来,《呼兰河传》的接受实绩主要集中在四种视阈上,即:文本审美、鲁迅影响、女性视野和文学定位;值得商榷的问题亦集中在三个观点上,即:“寂寞说”、“枯竭说”与两极化倾向。前者体现进展,后者有泡沫之嫌。

关键词:《呼兰河传》接受 70年视阈

2011年是萧红诞辰100周年,也是《呼兰河传》接受70周年。从1941年谷虹发表第一篇接受文章至2011年,《呼兰河传》的接受正好走过了70年历程。70年来,《呼兰河传》的接受实绩主要集中在四种视阈上,即:文本审美、鲁迅影响、女性视野和文学定位;值得商榷的问题亦集中在三个观点上,即:“寂寞说”、“枯竭说”与两极化倾向。在纪念萧红诞辰100周年与《呼兰河传》接受70周年之际,梳理这四种视阈的生成、流变及接受意义,探讨三个有待商榷的问题,无疑具有交流与纪念的双重意味。

### 一、文本审美

文本审美毫无疑问是《呼兰河传》最先展示并取得接受者呼应的接受视阈。1941年10月25日,上海杂志公司刚出版《呼兰河传》仅5个月,谷虹就在《现代文艺》第4卷第1期发表了第一篇接受文章《呼兰河传》,对文本的审美价值做出了开拓性的阐释。之后众多的接受者就《呼兰河传》的审美特性予以了充分的展示,在以下几个方面生成有待实现的期待视野:

1、体裁。《呼兰河传》的体裁是接受者首先面临的问题。与其它文本一目了然不同,《呼兰河传》的体裁特征却是最先得以介入但至今仍存分歧的接受视野。《呼兰河传》刚出版,谷虹就认为:“与其说这是一部长篇的小说,倒不如说是连载的散文更来得恰当些,因为它是由七篇可以各自独立的,而又是有连贯性的散文所组成的,末后再由作者加上一个‘尾声’,作为总结。”[1] 麦青也愿将其看作是诗化散文。[2] 石怀池则将《呼兰河传》与《生死场》、《马伯乐》一起看作是萧红长篇小说的代表作。[3] (P101)其实,“要点不在《呼兰河传》不像是一部严格意义的小说,而在于它这‘不像’之外,还有些别的东西;——一些比‘像’一部小说更为‘诱人’一些的东西。”[4] 因此,茅盾修正道:“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采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4] 这一视野耐人寻味亦影响深远。随后,德溶在认同茅盾的“三个一”的同时更希望将《呼兰河传》当作“童年自传”来读。[5] 至此,关于《呼兰河传》是什么体裁的视阈已基本生成,之后不同的视阈并未超出这些视阈。如王瑶认同《呼兰河传》是带有自传性质的回忆;[6] (P135)葛浩文视其为萧红“回忆式”文体的“巅峰之作”;[7] (P144)骆宾基称文本“是中国东北的一座小县城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风俗画”;[8] 杜秀华觉得,《呼兰河传》是一部以背景为主角的小说,只是从结构上看,倒很像一篇有景有情、有深刻思想内涵的优秀散文,是大部头的散文,具有散文美;[9] 王金诚将其定义为抒情性写实小说,是对传统的严格规约的文体形式的大胆突围;[10]

### 栏目列表 PART LIST

- |                     |                     |
|---------------------|---------------------|
| <a href="#">徐虹</a>  | <a href="#">其他</a>  |
| <a href="#">阎纯德</a> | <a href="#">路文彬</a> |
| <a href="#">李玲</a>  | <a href="#">方刚</a>  |
| <a href="#">舒芜</a>  | <a href="#">刘伯红</a> |
| <a href="#">张李玺</a> | <a href="#">陈骏涛</a> |
| <a href="#">于闽梅</a> | <a href="#">段江丽</a> |
| <a href="#">刘慧英</a> | <a href="#">张浩</a>  |
| <a href="#">陆薇</a>  | <a href="#">佟新</a>  |
| <a href="#">杨慧</a>  |                     |

### 其他相关信息

[· 相关其他文章推荐](#)

### 热门其他文章推荐

### 广告赞助商

### 其他文章阅读排

等。可以说,上述视野尽管阈值各一,但都基于《呼兰河传》的文体属性,也即是在认同文本是散文或小说的前提下视点略异。至于将其看作是叙事诗、风俗画、歌谣等,是对文本表现内容的一种形象的比喻,回忆体则更显得笼统。诚然,《呼兰河传》具有散文、小说、甚至诗的因素,也具有乡土气息、风俗画味与歌谣特质,但是,作为文学体裁的属性,将其视为诗化的小说(或抒情小说)更切合《呼兰河传》复合的文体特征。这也是目前大多数接受者所广为认同的期待视野,也是由之生发文本审美意蕴的接受基点。

2、寓意。本《呼兰河传》写了什么同样也是最先得以介入但至今仍存分歧的接受视野。对此主要集中在三种视点上:一是揭示生活在呼兰河底层的民众迷信与无知,愚昧与麻木的精神状态。最先指出这一视点的谷虹说:“在《呼兰河传》里,我们只能看到北中国乡村里人民的无知,迷信,穷困,不幸的生活,而且这一切也是轻描淡写的,被幽美的风景,浓厚的地方情调,以及风俗人情所掩盖着的。”[1] 麦青也有同感:“不论在哪一章里,作者都是在表现着呼兰河的住民的迷信与无知。他们习于那荒凉的贫乏的生活,他们对于生活,几乎像没有什么感觉一样。”“他们的生死态度总括起来就是:‘人活着是为吃饭穿衣。人死了就完了。’”“这就是作者所要表现的骨梗,作者就是依这个骨梗,用许多材料给它充实起来的。”[2] 40年后,邢富君等再次呼应了这一视点:“小说以呼兰小城的环境为主轴,通过对自己童年时代生活环境的回忆,描写自己家乡的美丽可爱,同时以幽默、讽刺的笔墨,写了家乡人们的愚昧、野蛮、无知和落后。”[1] 当然,也有接受者将这一视野扩展为揭示了中国农村在封建主义统治下的愚昧与麻木,[12] 但并没有实质性的推进。二是对病态社会与病态人生及其生存方式的深层拷问,对什么是现代健康、优美的人生样态与现代文明的真诚叩问。这是对前一视点的深化。韩文敏认为:“在走上觉醒和反抗之前,普通的中国人,世世代代经历着怎样一种人生?他们对待生活、命运的自觉性如何?他们的精神状态如何?……病态的人生、病态的社会心理是怎么形成的?是否还应该容许这种病态持续下去?如果不,又应该怎样来医治,才能使我们的人民过上人的生活,具有自由、健康、优美的心灵,真正享受人类的精神文明?这,大约就是萧红想要通过《呼兰河传》揭示并启发人们思索的,换句话说,也就是这部在战乱与流离中写了三年才写完的长篇小说的思想内核。”[13] 这与周成璐的视野相应和:“对于非人的生活和被扭曲的灵魂的描述与剖析,几乎贯穿着《呼兰河传》的全部。”“因此,作者把她的毕生的精力放在剖析人的内心世界,力图把人们从麻木的精神状态中唤醒过来的工作中。应该说,萧红的《呼兰河传》真实地反映了一个民族发展历史的一个阶段,在这个历史发展阶段中,作者向我们展现了封建统治在人们的思想中毒害之深,封建压迫在于他们的习以为常,这是一种更为可怕的精神麻木。不改变这种状况,社会就无法向前进步。”

[14] 三是人道主义视野。周成璐同时认为:“人道主义在《呼兰河传》中也是一个令人瞩目的命题”,虽然“作者并没有直接阐述她的人道主义的主张,而是通过人们在小团圆媳妇和冯歪嘴子的遭遇中所扮演的角色,刻画了人们对于残酷、悲哀的事情所持的那种变态的好奇心理和纵容的欲望,并以此作为其讽刺和鞭挞的对象,展示作者的人道主义的主张。”[14] 皇甫晓涛从新文学史的视阈考察后也认为:“《呼兰河传》在其深邃的审美拓展中,衔接上了‘五·四’新文学以来的人道主题、个性意识及由此而萌动的关于‘国民性’思考的文化指向。”[15] (P59)三类视野看似各异,实则联动,递进,也透视出接受者对萧红受鲁迅影响的深刻体悟,而这恰恰是打开文本意义潜势的一个更为有效的阐释路径。

3、叙述艺术。《呼兰河传》之所以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除了内容的独特之外还得益于作家出色的叙述艺术。那么,到底是怎样的叙述艺术为文本增添了别样的风采?李采章认为:“小说第一、二章的第三人称全方位鸟瞰与后面诸章的第一人称‘我’的有限陈述、观察交织起来的人称叙事策略,完满地体现出呼兰小城及其市民的文化风貌和精神品格。”[17] 周筱华则将作品的成功归结为多种手法的运用使她的小说具有一种清妙灵秀的美的魅力。[18] 王金诚从文体风格与叙述策略的视角上指出,萧红极富创意地设定了三层叙述结构、两种叙述视角和两套叙述话语并使之融为一体,合力建构了《呼兰河传》的先锋叙事。[10] 上述视野固然有其合理之处,但却忽略了文本中一个最重要的也是一个最基本的视角——童年视角与文体的关系。张宇凌从这一视角切入认为:“儿童视角及其背后的创作精神,正是使萧红这位作家及《呼兰河传》这部奇书产生这份‘独特’的重要原因。”[19] 随后,陈美兰对此进行了补充:成年人的全知视角与童年的限制视角交叠式的叙述方式使《呼兰河传》别开生面。这一视野已为众多接受者所认同。

[20] 陈文同时对一些接受者认为小说文体与整体构思存在着罅隙提出了修正:“《呼兰河传》因其散文化的特点,致使有人草率地认为它没有中心人物,也缺乏中心线索。这种看法并不准确,小说的中心人物其实就是叙述者的‘我’,是童年的和成年的‘我’,而

贯穿小说全篇的，则是‘我’的情感‘轴线’。这是一条情感元素相当复杂的‘轴线’，它融着萧红历尽人生坎坷、在落寞中所唤起对天真无邪童年生活的亲切感；也体现了一位对民族的今天和未来有着庄严使命感的作家，在对故土的理性审视中所产生的深深忧虑感和对改造‘国民性’的期盼。这些复杂情感的纠缠，汇成了贯穿作品的主旋律，也将各章不同的故事组结为一个艺术整体。”[20]这一视野矫正了一些接受者对《呼兰河传》的文体认知，也释解了小说的艺术魅力，具有更强的说服力。不过，萧红真将视野从表现手法拓展为作家感受世界的一种方式即民间视角，从而提出：“‘意识到的历史内容’与民间的叙事立场，形成了萧红观察世界最基本的视角：这就是民间的历史视角。也就是说，她是从民间的生存与记忆，观察、理解和叙述、参与了民族的现代性历史建构，完成对于民族特定阶段的历史言说。”[21]也成一家之言。由上可知，对于《呼兰河传》的叙述艺术，接受者各具视野，各呈期待，但无论将《呼兰河传》的叙述艺术理解为表层的叙事手法还是先锋的叙事策略，无论是童年与成年的双重叙事还是现代与历史的民间视角，都是对《呼兰河传》叙述艺术的补充与完善，也无论它是否为接受者所认可，是否转化为既定视野，它们都为不断深化的《呼兰河传》的审美接受铺垫了前行的基石，而后来者所做的只是在此基础上前行。

## 二、鲁迅影响

萧红成名缘于鲁迅的举荐早已是文坛人人皆知的一段佳话，而鲁迅在《生死场》出版时写下的一段文字更为接受者所广泛引征：“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的明丽和新鲜。”这既是对《生死场》的分析，又可看作是对《呼兰河传》的预言。的确，在萧红身上，在《呼兰河传》里，鲁迅的影响无处不在，萧红在“写什么”、“如何写”和“为什么写”方面深受鲁迅的影响已成为学界的共识。具体而言，接受者就萧红与导师鲁迅的影响生成了如下两种既定视野：

1、对人物生存哲学的艺术展示，即对历史惰性力量的艺术揭示。这是钱理群在纪念鲁迅诞辰100周年和萧红诞辰70周年时的提炼。他说：“鲁迅与萧红作品中的社会风俗画的描写，是一般读者都能注意到的，但人们往往把这看作是增加作品色彩的一种手段，而不能从作家对于生活的独特认识和作家文学观的全局去认识它的意义。人们也往往把这种风俗画的描写局限于富有地方色彩的风光习俗，而忽略了巴尔扎克所说的更‘基础’的东西：民族的生活方式，‘人的心的历史’、‘社会关系的历史’，这正是鲁迅、萧红笔下的社会风俗画的主要着力点。鲁迅把这种描写散落于全部情节之中，而萧红在《呼兰河传》等作品里，则不惜将情节的发展中断，进行集中的描绘。这确实有些破格，并且因此受到责难。萧红却置之不理，她有着自己的追求；也许正是这一点，构成了萧红创作的主要特色。”他同时认为：“从日常平凡的生活中感受到、捕捉到如此惊心动魄的东西，这不仅是艺术的才能，更是思想的才能；而这一切的原动力又是与民族命运生死与共的，刻骨铭心的爱国之情！”因为“在死水一般的生活里，唯一起着作用的是历史的情性力量。”

[22]这一惊人的发现道出了萧红在“写什么”上深得鲁迅神髓的精神脉相，点化了萧红写什么的创作诉求以及如何写的内在缘由。这是萧红研究的新起点，也是萧红与鲁迅影响研究的重要突破，不仅迅速生成既定视野，也因之贯穿起鲁迅与萧红创作的精神联系，至今仍为广大接受者所认同并叹服：“正如钱理群指出，《呼兰河传》时期的萧红以自己年轻的女性之躯跋涉过漫长的道路，以自己女性的目光一次次穿透历史，之后，终于同鲁迅站在了同一地平线，达到了同一种对历史、对文明、对国民灵魂的去、现在、未来的大彻悟。”[23]（P190）

2、对改造国民灵魂总主题的传承与发扬。这同样由钱理群率先展示并予以提升。他说，鲁迅从“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这个角度充分肯定萧红创作思想和文学价值，是真正的“知人”之论。虽然“萧红的作品里，甚至像赵太爷、鲁四老爷这样的代表社会邪恶势力的反动人物都不曾出现，有的只是‘柳妈’——‘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的善男信女们。正是这些善男信女和小团圆媳妇们的矛盾冲突，构成了萧红笔下的悲喜剧。这是更深刻的悲剧：吃人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已经渗透到民族意识与心理之中，成为‘历史’的力量，‘多数’的力量。这是更普遍的悲剧：古往今来，直接死于统治者屠刀的人少，更多的却死于‘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的不见血的‘谋杀’之中，这难道不是一个痛苦的、令人难以接受的铁的事实？站在历史的高度上看，这又何尝不是一出民族的愚昧、人性的扭曲的喜剧？”当然，萧红之于鲁迅的创造也是显在的，她毕竟提供了鲁迅所不曾提供的东西，这就是：“萧红用她那为鲁迅所称道的‘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感受，最早敏锐地抓住了社会心理与社会关系上的微妙变动，用她那‘越轨的笔致’写下了‘人的心的历史’、‘社会关系的历史’、‘新鲜人的历史’、‘历史的’（动物



‘人的心的历史’、‘社会关系的历史’上‘新鲜’的一员。……麻木的‘动物般’的人们第一次感到了人的尊严，民族的尊严！我们古老的民族毕竟是有生命力的，它终于获得了一颗‘猛壮’的、‘铜一般凝结’的‘心’！萧红以不可抑制的喜悦捕捉住了、并写下了这一切时，充满了一种历史感。她清醒地把这民族心理与社会关系的变化看作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比之麻木、冷漠的过去，这无疑是巨大的历史的进步；然而，我们的民族与人民也没有在一个早晨就‘突变’为英雄，它依然背着历史传统的重负。唯其如此，这个民族明天必然有更伟大的发展与前途。萧红所要完成的，正是鲁迅曾经提出过的历史任务；真实地、历史地写出我们的民族、人民从‘个人主义’到‘集团主义’其间的桥梁。萧红的历史贡献也在这里。”[22] 钱文高屋建瓴，鞭辟入里，不仅是萧红与鲁迅接受研究的起点文献，也是萧红与鲁迅影响研究史上一个最重要的视野，之后虽有众多接受者对这一视野进行再思考，如秦林芳的补充，[24] 黄晓娟的具体化等，[25] (P178)但并没有实质性的超越与突破。

总之，“写什么”、“如何写”和“为什么写”是萧红在鲁迅那里得到的最直接也是最根本的创作启示，也是萧红之所以为萧红的文学意义之所在。从这一视阈解读萧红和她的《呼兰河传》无疑是最“知人论世”的接受视野，也是最易为接受者所共鸣的接受视阈。诚然钱理群的视野提高了后续者跨越的门槛，但唯有如此才彰显出萧红研究的深度，才彰显出《呼兰河传》接受的进展，才促发学界对这一视阈进行更深入更系统的思考。也正如此，我们说，正如鲁迅研究的突破必将带动现代文学研究的突破一样，萧红与鲁迅影响研究视野的突破，亦将推动萧红研究的历史性突破。

### 三、女性视阈

女性视阈是 80 年代之后迅速兴盛并至今仍有广泛吸引力的接受维度，它拓宽了萧红研究的接受视阈，也为接受者多维展示《呼兰河传》的审美意蕴开辟了通道。

1、女权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双重主题。《呼兰河传》是萧红再次以泣血之笔写就的一部揭示呼兰河妇女令人发指的生活境遇及其悲惨命运的血书，因此，“对于非人的生活和被扭曲的灵魂的描述与剖析，几乎贯穿着《呼兰河传》的全部”。[14] 为什么会如此？作者的寓意何在？周成璐认为：“这里包含着两个主题，一是女权主义，二是人道主义。这两个主题是相互交溶在一起的，并且作者往往是通过美与丑、善与恶的交锋，在美与善的被扼杀、被践踏中，来表现她的女权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思想的。”[14] 这是最早的一篇以女权主义与人道主义视野解读文本的接受文章，也是具有拓进力度的接受视野，可惜未能得以呼应与深化。

2、女体符号学与乡土叙述。这是由林幸谦敞开的新视野。作者认为：“萧红的小说文本表现了两性关系 / 性别意识与民族国家文化历史的双重主题。在民族国家文学之外，女性文本的多元特质在她的文本书写中进一步得到延续，为中国现代女性文学遗产开拓出富有符号性意义的女体空间和女性乡土想象书写。在萧红的《呼兰河传》中，萧红大量地书写了女体空间所可能载的各种符号形态，特别是有关跳大神的仪式化女体现象。萧红笔下女性所构成的女体符号空间，其根基建立在民间文化的基础之上。与乡土想象有密切的关系。事实上，萧红对女体的想象书写和乡土的文化空间建构是双线并行的，缺一不可。此种女体 / 乡土叙述突显出历史文化交织的符号空间，乡土的象征功能是女性作家藉以窥探女性内宇及社会文化系和人生命运不可或缺的书写策略。”[26] 令人耳目一新，堪称亮点。

3、一个具有文化背负力的形象。《呼兰河传》并非是一部擅长人物刻画的长篇小说，除有二伯以外，作家并没有特别精心刻画某个人物形象。赵德鸿、张冬梅从女性意识的角度将人物置于文化学的立场上予以考察，断言“胡家婆婆”是一个最具典型意义、最具文化背负力的形象，即：她们同时扮演着牺牲品和刽子手的角色，显出新意。文章认为：“在《呼兰河传》中，萧红从女性立场和女性意识出发，以强烈的女性觉醒意识关注和揭示女性个人和群体的苦难命运，向读者展示了一幅幅女性苦难生存的现实图画，表达了她对可怜可悲的女性人生命运的深切体验和对造成女性苦难命运背后潜在的巨大社会毒害力量的批判。她用女性的命运观照国民的命运，再用国民的命运去观照整个社会和国家的命运，并清醒地认识到女性世界的悲剧正是男权意识垄断的社会对女性的愚弄和毒害的结果。”也正因此，“《呼兰河传》以其巨大的文化承载，表达了萧红作为女性特有的对同类乃至普泛人性的体察与关怀，使小说的哲学和美学意蕴具有了普遍意义，从而获得独特的审美效果。”[27] 这同样是《呼兰河传》人物接受研究上的一个新开掘点。

当然，女性视阈中还有一些接受视野也值得重视，例如，呼兰河是萧红意味深长的空间形式，也象征着萧红生命的两重性：对流浪 \ 安居同样强烈的渴望；[28] 萧红小说最精彩、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她女性视角的生命体验，[29] 等，但总体而言，面对不断涌现的

接受成果，我们也不得不说，真正具有拓新价值并给人以启迪同时又为接受者所认同、所呼应的视野并不多。上述三个阈值亦未能形成接受环链而深入下去，颇为遗憾。按理说，女性视阈在当下本是极具张力的接受维度，但接受者或者囿于女性研究的思维与特性，或者陷于女性文学的狭隘视阈，常常视界较为单一，细腻有余而深度不足，感性有余而理性不足，重复有余而创新不足。对此，乔以钢深有感悟地说：“萧红的创作告诉我们，中国女性文学的内涵并非仅限于‘性别书写’。它不是温室里的花朵，而是植根于广袤的土地。女性文学无疑具有‘性别’特质，但这‘特质’并非来自任何抽象的理念，而是受制于社会文化生存的历史和现实，以及人类个体或隐或显的性别意识对文学活动的渗透。特别重要的是，它从来不是‘惟性别’的。女性文学承载的是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它是历史文化的产物，也是社会文明进程的透视镜。女性体验、女性立场赋予萧红的创作鲜明的特征，但这并不足以概括她创作的全部。她的作品以立体化的生活场景和复杂深邃的人性启示我们：性别问题绝非单一的存在，而是注定同阶级、民族、时代政治乃至个体精神倾向等多重因素融会在一起。那么，当我们面对萧红以及其他女作家，围绕‘女性文学’展开种种探讨时，眼界是否应当更开阔一些，思考是否可以更深入一些呢？”[30]。振聋发聩，发人深思。

#### 四、文学定位

《呼兰河传》是萧红的代表作，也是她为新文学留下的宝贵财富。随着萧红文学地位的全面提升，《呼兰河传》的文学地位也从最初的笼统肯定转向目前明确的、充分的肯定。

1、抒情小说的桥梁与经典之作。《呼兰河传》的抒情性是其誉满天下的重要因素，因此，从抒情小说的视野对其予以高度的肯定就成为众多接受者一致的维度：“她在《呼兰河传》中，将深沉的民族忧痛寓于乡土风情和童年人事的回忆，将抒情描写和乡土写实紧密地融合，塑造了独具特色的人物形象，牵动着人们思念故国、拯救乡土同胞的情怀。今天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呼兰河传》以形象的丰富和抒情方式的成熟，已达到当时现实主义乡土抒情小说的一个高峰。”[31]“萧红具有诗人的天赋。这不仅表现在她写作的诗歌中，也浸透在她的小说里。《呼兰河传》是一部优秀的抒情小说，不仅语言精练，韵律感强，而且具有复沓的节奏；内在的情感也是丰富充沛的，一唱三叹，起伏跌宕，深沉而忧郁。萧红的抒情才华，沟通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抒情小说的传统。……萧红是中国二十世纪汉语写作的一个成功范例。”[32]王金城也将其视为20世纪小说史的经典杰作。因为，作为一部抒情性写实小说，“小说的叙述策略也是创造性的。它以‘五个乐章’的平行并列方式回应‘呼兰河’主体旋律，创造了小说块状连缀的‘中层结构’；又以‘时间、空间、人生’三位一体的奇特组合，创造了富有生命意蕴和哲学象征的‘深层结构’。极富创意地设定了两个叙述者、两个视角和两种女性话语的叙述谋略，使成人系统的冷静与儿童系统的天真交相辉映，创造了诗意抒情与冷静写实融合的精神气象与美学神韵。”“正是这前卫的创造性艺术形式与超越时代的深邃思想内涵的合力运作，才共同构建了富有永久亲和力的《呼兰河传》独特的文本世界。”[10]的确，由废名的《桥》到孙犁的《风云初记》，萧红的《呼兰河传》恰是其间沟通中国现代抒情长篇小说的一个重要的桥梁与经典。

2、改造国民性主题的承上启下之作。这是由萧红受鲁迅影响而生成的接受视野。皇甫晓涛从主题视野出发重新定位了《呼兰河传》的意义：“《呼兰河传》出现在四十年代文坛上，不仅开辟了左翼文学农村题材的新视野，为抗战文艺寻找到了—条潜在的审美线索，避免了其简单化、概念化的缺陷；而且与时代审美要求在整体上是一致的，同时也为‘国民性’主题的发展寻找到一个新的转折点。”“它在徘徊难进的中国现代文化思想及其审美形式时断时续的历史发展中，是起到了一种‘衔接’作用和促进作用的。”

[15] (P72-74)令人信服，亦有望生成既定视野。

3、一首归返精神家园的史诗。郭玉斌说：“《呼兰河传》在四个方面表现出诗化特性：即：诗的纯净、诗的风情、诗的意境、诗的律动。童心美使作品充满了童真、童趣；地域性给作品敷上了特异的文化色彩，丹青妙笔绘出了北国风光，复唱、用韵等又奏出了咏叹调。这一切构成了一首归返精神家园的史诗。”[33]

此外，还有一些接受者从女作家与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视野中发掘萧红的历史地位，[34]或总体肯定萧红的历史贡献，如“以生命实践为特征的启蒙立场的坚守，具有地理坐标意义的地域风格的开创，粗犷而悲壮的女性意识的表达，对生命悲悯的人道主义关切，文体创造的自觉与实践，是萧红对百年中国文学发展的卓越贡献，也是其文学创作经典价值的核心构成。”[35]“在她的作品中，社会生活的场景及其细节的组织与充满原始意味的北方田园风光有着自然而亲切的契合，把怪诞因素融入叙事文体，从而使刻板

原始意味的北方由西风兀有着自然而亲切的语音。托打困因素渗入叙事文体，从而使刻板的或繁冗的叙述充满灵动活泼的氛围。这是萧红在文学创造和文体建设方面的贡献。”

“从表层的现象，特别是透过喧闹的社会生活场景企及人生的底蕴。当周围的人们表现出昂奋的激情，而萧红却悄悄地又是沉重地触及了人生悲凉，这正是她有别于人的深刻。”

[36]等，以之审视《呼兰河传》亦是切合文本且客观而公允之论，亦成为萧红接受研究的重要视野。但因与本文题旨偏离，故不一一展示了。

### 五、三个问题

70年来，《呼兰河传》接受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在文本审美、鲁迅影响、女性视野及文学地位的展示上，生成了众多有待实现的期待视野，其中的一些期待视野生成为既定视野，成为新文学研究中重要的视点，体现出《呼兰河传》接受的学术进展与价值，但接受研究中暴露出的三个问题也值得我们思索：

1、“寂寞论”。这是茅盾提出的视野，也是萧红接受研究影响最为深远的既定视野。不过，近年来有学者提出异议，认为，茅盾在《(呼兰河传)序》中认为该作品是萧红的寂寞之作这个多年来被奉为经典的论断，实际上是历史的误读，《呼兰河传》的艺术特质是喜剧性的幽默讽刺，寂寞是作品的艺术表象。而此时和端木在港的萧红，迎来了她创作最辉煌的年代，并无寂寞可言。有关由此派生的萧红性格、感情、经历的传闻和对有关作家的贬损，都来自人事的纠葛和男权的偏见。[37]此论一出，即遭到接受者的反驳，

[38]论者于是再撰文予以反批评。一时间，这一争论似乎成为《呼兰河传》接受研究的热点话题。其实，这一争鸣并非学术的生长点。萧红写作《呼兰河传》时是否“寂寞”是个无解亦无需证明的视野，“寂寞论”者可以举出诸多“例证”证明“寂寞”之所在；“反寂寞”者同样可以举出一些“例证”证明“非寂寞”之现实，双方都认为只有己方才是唯一正确的结论并以此压倒另一方，且不说以文本去推测故去作家的内心感受与彼时的心境是否有可击之处，只说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就使这一争鸣失去了学理的价值，更何况“寂寞”的思绪在《呼兰河传》中是一个无法抹杀的客观存在。即便没有“寂寞”之思绪流溢文本，也丝毫不影响《呼兰河传》的文学价值及萧红的文学地位，更何况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也是接受的常态。

2、“枯竭说”。这是当年石怀池评价《呼兰河传》的艺术性时，认为萧红的创作与现实相脱节而提出的“著名”视野。[3] (P101-102) 1980年代之后，随着萧红地位的逐步提升，众多接受者为了肯定《呼兰河传》的艺术成就，遂以驳斥石怀池的苛求为前提，仿佛不如此就显出对萧红接受研究历史的无知，不如此就不足以显示萧红创作的伟大，这同样是接受者思维情绪化的一种表现。萧红出版《呼兰河传》半年后就病逝于香港，讨论其创作是否枯竭或者旺盛已没有多少学术价值，更何况这仍是一个无法证明也无需证明的话题。

3、两极化倾向。与历史曾经埋没《呼兰河传》不同，今天的《呼兰河传》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传承于世，萧红的文学地位亦随之而日益提高。但是，这是不是说对《呼兰河传》的评价就应该越高越好，否则就对不起“三十年代的文学洛神”[39] (P352)诚然，说“《呼兰河传》仍给人以‘略图’和草稿的”感觉，[40]有过于贬低之嫌，但断言《呼兰河传》“是20世纪人类回归心灵家园和精神故乡的深度寓言，是人类永恒的‘回家’之歌，是对整个人类精神思想领域的深沉潜航”，萧红则“是站在了精神再造的文化制高点上，对病态社会的生态、病态民族的心态与病态灵魂的丑态进行了深刻的文化批判，是对整个中华民族精神思想领域的深沉潜航。”[41]是否也有过于拔高之嫌呢？过度贬低固然不妥，但随意拔高又走向了另一极端。在此，我们想起钱理群的观点：“萧红只是惊人真实地描绘出历史惰力的可怕力量，却未能揭示原因：她在历史的现象面前止了步。萧红具有鲁迅那样的艺术家的敏锐的感受力，也许在思想家的鲁迅所特具的深邃的思想力方面有所不足。”[22]我想，这才是实事求是的评价。任何走向极端的阐释都是经不起历史践检验的，也是学术的泡沫。

最后，笔者需要特别说明的是，70年来《呼兰河传》的接受也在比较文学与文学比较、悲剧与喜剧美学、地域文化等视阈生成了有待实现的期待视野，在文体介入与女性文学的研究上也存在有待思考的问题。但笔者认为，上述四种视阈更能代表《呼兰河传》的接受水平，这三个视点亦更具有商榷的典型意义，为篇幅及行文方便之故，加以论之。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 参考文献：

[1] 谷虹. 呼兰河传 [J]. 现代文艺, 1941(1).

[2] 麦青. 萧红的《呼兰河传》 [J]. 青年文艺, 1942(1).



- [3] 石怀池. 论萧红 [A]. 石怀池文学论文集 [C]. 上海: 耕耘出版社, 1945.
- [4] 茅盾. 论萧红的《呼兰河传》 [J]. 文艺生活, 1946(12).
- [5] 德溶. 呼兰河传 [J]. 妇女, 1947(4).
- [6] 王瑶. 中国新文学史稿(下) [M]. 上海: 上海新文艺出版社, 1953.
- [7] 葛浩文. 萧红评传 [M].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5.
- [8] “内容提要”. 呼兰河传 [M]. 上海: 上海新文艺出版社, 1954.
- [9] 杜秀华. 一部以背景为主角的小说——兼谈《呼兰河传》对中国现代小说的贡献 [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1986(4).
- [10] 王金城. 诗学阐释: 文体风格与叙述策略——《呼兰河传》新论 [J]. 复旦学报, 2002(6).
- [11] 邢富君等. 肖红创作初论 [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1981(3).
- [12] 赵凤翔. 肖红论 [J]. 开封师院学报, 1979(1); 钟乳霖. 萧红的十年文学道路 [J]. 北方论丛, 1981(5).
- [13] 韩文敏. 《呼兰河传》我见 [J]. 文学评论, 1982(4).
- [14] 周成璐. 从《呼兰河传》看肖红的创作主题 [J]. 上海大学学报, 1987(3).
- [15] 皇甫晓涛. 《呼兰河传》的历史开掘 [A]. 萧红现象 [C].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1.
- [17] 李采章. 《呼兰河传》的叙事策略及其文化意味 [J]. 求是学刊, 1995(5).
- [18] 周筱华. 《呼兰河传》与萧红的“小说学” [J]. 安徽大学学报, 1995(3).
- [19] 张宇凌. 论萧红《呼兰河传》中的儿童视角 [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1997(1).
- [20] 陈美兰. 《呼兰河传》的叙事视角和情感张力 [J]. 语文教学与研究, 2008(3).
- [21] 季红真. 溃败: 现代性劫掠中的历史图景——论萧红叙事的基本视角 [J]. 文艺争鸣, 2011(3).
- [22] 钱理群. “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与萧红诞辰七十周年 [J]. 十月, 1982(1).
- [23] 孟悦、戴锦华著. 浮出历史地表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98
- [24] 秦林芳. 鲁迅小说传统与萧红的小说创作 [J]. 鲁迅研究月刊, 2000(1).
- [25] 黄晓娟. 雪中芭蕉——萧红创作论 [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3.
- [26] 林幸谦. 萧红小说的女性符号与乡土叙述——《呼兰河传》和《生死场》的性别论述 [J]. 南开学报, 2004(2).
- [27] 赵德鸿张冬梅. 萧红《呼兰河传》的文化阐释 [J]. 学术交流, 2007(5).
- [28] 宋晓萍. 萧红的地: 封锁和游离——关于《呼兰河传》及其女性空间 [J]. 天津社会科学, 1999(4).
- [29] 宋剑华. 灵魂的“失乐园”: 论萧红小说的女性悲剧意识 [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4(4).
- [30] 乔以钢. 萧红与中国女性文学——纪念萧红百年诞辰 [J]. 文学与文化, 2011(3).
- [31] 张国祯. 民族忧痛和乡土人生的抒情交响诗——评《呼兰河传》 [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1982(4).
- [32] 季红真. 叛逆者的不归之路 [J]. 读书, 1999(9).
- [33] 郭玉斌. 《呼兰河传》: 纯美的大荒诗魂 [J]. 学术交流, 2005(3).
- [34] 单元. 萧红与 20 世纪中国女性文学 [J]. 湘潭大学学报, 2002(6).
- [35] 张丛皞. 谈萧红的文学史价值——为萧红诞辰百年而作 [J]. 学习与探索, 2011(3).
- [36] 陈素琰. 萧红: 早醒而忧郁的灵魂 [J]. 文学评论, 1994(4).
- [37] 王科. “寂寞”论: 不该再继续的“经典”误读——以萧红《呼兰河传》为个案 [J]. 文学评论, 2004(4).
- [38] 陈桂良. “寂寞”论果真是对萧红作品的“经典误读”? ——也谈茅盾评《呼兰河传》并与王科先生商榷 [J]. 文艺争鸣, 2005(3).

[39] 杨义. 中国现代小说史(第 2卷) [M]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

[40] 王彬彬. 关于萧红的评价问题 [J] .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11( 8).

[41] 王金城. 主题形态:精神归返与灵魂挽唱——《呼兰河传》新论 [J] . 北方论丛, 2003( 1). 责任编辑:春晓

(责任编辑: admin)

 顶一下 (0)

0%

 踩一下 (0)

0%

分享到: [QQ空间](#) [新浪微博](#) [开心网](#) [人人网](#) [百度搜藏](#) [豆瓣](#) [腾讯微博](#)

• 上一篇: [陈晓颖: 看女性难以逃脱的“他者”“被看”地位——从女性主义视角解析电影《黑天鹅》](#)

### 文章特别说明

此处放横条广告

## 广告赞助

## 最新评论

[查看全部评论 >>](#)

### 谈谈您对该文章的看

表 情:

评论内容:

匿名?  中立  好评  差评

[发表评论](#) \* 请注意用语文明且合法, 谢谢合作 审核后才会显示! [Ctrl+回车](#) 可以直接发表

## 阅读说明 READ EXPLANATION

- ◊ 推荐使用网际快车下载本站软件, 使用 WinRAR v3.10 以上版本解压本站软件。
- ◊ 如果这个软件总是不能下载的请点击报告错误, 谢谢合作!!
- ◊ 下载本站资源, 如果服务器暂不能下载请过一段时间重试!
- ◊ 如果遇到什么问题, 请到本站论坛去咨寻, 我们将在那里提供更多、更好的资源!
- ◊ 本站提供的一些商业软件是供学习研究之用, 如用于商业用途, 请购买正版。

[关于我们](#) | [版权说明](#) | [免责声明](#) | [联系我们](#) | [网站地图](#)

Copyright 2005-2008 All Right Reserved 北京语言大学性别文化研究办公室 京ICP备09012027号 Power by DedeCms

免责声明: 本站部分资源来源于网络, 如有侵权, 请 [点此联系我们](#), 我们将会尽快处理, 谢谢!

基于: DedeCms 设计: 理想网络